

费西金对机会“平等化”的批判及其机会多元主义

张虎

(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山东济南, 250002)

摘要: 费西金认为通常意义上的机会平等把“平等化”作为思考机会分配和建构的最佳范式, 但是机会平等化面临四个问题——家庭问题、功绩问题、起跑门问题和个性问题, 因此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他提出了重建机会平等工程的方案——机会多元主义, 强调构建多元的机会结构, 打开创造和获取机会的“瓶颈”, 以使人们有更多“追求人的兴盛”的路径。费西金指出了平等主义正义理论通常忽视的问题——机会平等的理想应该为所有人提供什么样的机会和机会的组合, 但这并不意味着能够超越分配正义来理解该理想。

关键词: 机会平等; 费西金; 机会多元主义; 反瓶颈原则; 运气平等主义

中图分类号: B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8)04-0025-07

德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约瑟夫·费西金在其《瓶颈: 新的机会平等理论》一书中认为, 通常意义的机会平等存在很多难以克服的问题, “只能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1](35)}。他主张应该“重新构建机会, 使人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能有更多的机会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追求人的兴盛(human flourishing)”^{[1](2)}。费西金对机会平等工程的重建体现在其“机会多元主义”的主张之中, 尤其是其中的“反瓶颈原则”。

一、对机会“平等化”的批判

费西金认为通常意义上的机会平等理论把平等化“作为思考机会分配和建构问题的最佳范式”^{[1](15)}, 但是“机会平等化不仅在某些情况下无法实现, 或者不值得期许, 而且还忽略了很多其他的东西: 它没有触及社会应当如何建构机会这一议题中许多规范性层面的问题”^{[1](15)}。要了解费西金对机会平等化的批判, 首先要了解他对机会平等之特殊价值的强调。

(一) 机会: 自由和对人自身的塑造

机会平等通常与提高效率和奖励应得连在一起^{[2](96-99)}。提高效率 and 奖励应得的另一面是对不平等结果的容忍, 这是其显得更偏保守主义的原因所在。

但是费西金认为机会平等的理念非但不保守, 反而很激进。一方面, 机会平等也是一种自由的体现。获得一个机会常常意味着开启一扇人生的大门, 增加一条生活的路径和一种自我实现的可能性。“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宏观的时间段上人们对机会平等的兴趣越来越浓厚……是因为我们对人的可能性的理解越来越深入。”^{[1](66)}机会越多, 人成就自己的空间也就越广阔, 反之就越狭促。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为所有人创造和开放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也就为所有人带来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比如政治等级制的覆灭给大多数人带来了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很多机会, 也就解除了他们身上的很多枷锁; 职场中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消除也为少数民族和妇女开放了很多的人生路径。与费西金一样, 罗尔斯也曾指出机会平等使更多人体验到“热情机敏地履行某些社会义务而产生的自我实现感”, 而这是“一种重要形式的人类善”^{[3](66)}。

另一方面, “机会在塑造我们身份时发挥了作用”^{[1](4)}。社会中存在什么样的机会结构, 人们也就相应地发展出什么样的偏好、志向和能力。如果社会的结构简单呆板, 推崇的价值严格单一, 那么其成员的偏好、志向和能力也就同质稳定; 如果社会的结构比较复杂, 但是存在沃尔泽所说的一种价值(比如金钱)对其他价值的“支配”, 那么其成员就不得

收稿日期: 2017-11-24; 修回日期: 2018-05-13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女性主义哲学视野下家庭-工作冲突的产生、实质及解决路径”(18DZXJ01); 山东社会科学院博士基金项目“当代政治哲学话语中平等理念的多元维度解析”

作者简介: 张虎(1987—), 男, 山东平阴人, 哲学博士, 山东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当代西方道德和政治哲学, 联系邮箱: jasonchang1987@qq.com

不压抑自己的多元偏好而优先追求这种支配性的价值；如果社会的机会结构要求很多残酷的零和博弈，那么其成员就会将精力投放到这种竞争上，利用能够利用的一切来保证胜出。费西金认为这些机会结构对人身份的形塑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主张构建多元的机会结构，突破阻碍人们获取丰富机会的“瓶颈”，以创造更多“追求人的兴盛”的路径。

(二) 机会平等化的理论

争议最少的机会平等原则是“职位向人才开放”(careers open to talents)。该原则要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机会应该面向所有人，公平竞争，唯才是举，而不管他们在政治法律上的等级地位和他们的种族、民族、性别、性取向、信仰，等等。该原则在反对等级制和各种各样的社会歧视方面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为大多数人打开了曾经专属于一部分人的生活路径。

但是，伯纳德·威廉姆斯以“武士社会”为例指出这是非常弱的一种机会平等要求：一小部分拥有武士头衔的人在某个社会享有很多特权，该头衔原来只属于最健壮的富人子弟；这时追求社会公正的改革得以贯彻，对武士头衔的竞争开始不论贫富向所有人开放，但是选拔的结果出人意料，被选的大部分武士仍然来自富裕阶层，原因是富人在获取充足的营养和昂贵有效的体质训练方面比穷人有很大的优势，而这直接左右了竞争的结果^{[4](99-100)}。职位向人才开放的本质通过这个例子显露出来——它只是在形式上把参与“竞赛”的资格给予所有人，而没有在实质上保证他们都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一些因素仍不公平地影响着人们对机会的获取。正因如此，职位向人才开放的原则也被称做“形式的机会平等”。

使赛场更公平(leveling playing field)是罗尔斯的“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运气平等主义的理论指向。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规定：“假定有一种自然禀赋的分布，那些处在才干和能力的同一水平上、有着使用它们的同样愿望的人，应当有同样的成功前景，而不管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最初地位是什么。”^{[3](56)}这即是要求阶级和家庭这样的社会因素不能不公正地影响人们对机会的获取。机会平等不仅意味着在所有人中选拔最有能力的人，而且意味着为所有人提供培育和发展这种能力的平等机会，以使天赋卓越又勤奋努力的人不致因为糟糕的家境而不能实现好的人生前景。为达到这样的目的，社会尤其要重视教育的作用。罗尔斯就指出，无论公立还是私立的学校体系“都应当设计得有助于拆除阶级之间的藩篱”^{[3](57)}。

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把参赛者的家境条件看作道

德上偶然和任意的因素，着力消除其对比赛结果的影响。运气平等主义是对这种逻辑的进一步推演，其把人们自身不能选择和决定的天赋状况也看作不应该影响比赛结果的变量。运气平等主义主张“没有人应该仅仅由于一些其本人没有选择招致的偶然事件而比别人拥有更少的有用资源和机会”^{[5](1)}。这种偶然事件既包括一个人出生时所处的阶级和家庭地位，又包括他的自然禀赋，这些都不是个人能够自主选择的“环境”或“原生运气”(brute luck)。运气平等主义指出比赛结果应该反映参赛者自己能够负责的“选择”变量(包括努力程度)，而不是他被动楔入的环境变量，如此才算建构了公平的赛场，也就是给所有人提供了平等的机会。那么怎样才能使选择或努力程度相同、但天赋迥异的人具有相似的成功前景呢？运气平等主义者首先想到的是用医疗手段来纠正某些人的基因劣势，但这面临技术和道德上的很多问题，于是他们提出了对自然禀赋较差者的资源补偿策略^{[6](61-118)}。

(三) 机会平等化的四个问题

费西金认为上述的机会平等观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理由如下。

首先是家庭问题。父母传递的不仅是经济方面的优势劣势，他们还从言谈举止、气质做派、应对困难和承受压力的能力等方面影响了子女，比如幼儿在睡前能否听到父母讲的故事将极大地影响他们的未来表现。而抵消这里的差异常常意味着对父母的育儿行为进行不恰当的监控和干涉，甚至要将此替换为集体抚养，但“父母有选择生育并且以特定方式育儿的自由和自主权”^{[7](76)}，这种权利不能因为对机会平等的追求而被牺牲。罗尔斯也指出，公平的机会平等“只能不完全地实现，至少在某种家庭形式存在的情况下是这样”^{[3](57)}。

其次是功绩问题。罗尔斯要筛除社会环境因素对人的“功绩”(merit, 亦即特征或行为)的差别化影响，只根据人的禀赋和努力程度来分配机会；运气平等主义者想进一步筛除自然因素(如基因)的差别化影响，只根据人的选择(包括努力程度)来分配机会。在他们的立场中都存在费西金所说的“孤立主义”(isolationist)的假定，即将环境、基因、主体的选择等看作“单独、孤立的因果作用”^{[1](139)}。费西金引用了很多生物哲学的观点质疑了这种区分。他指出：“对遗传和环境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它们远不是两种对最终结果做出各自独立贡献的独特的因果作用力，我们甚至不应该认为它们是各自单独存在的。”^{[1](140)}另外，人们的选择也很难从环境中抽离出来，例如“使我们努力培养我们

的能力的优越个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幸运的家庭和早期生活的环境”^{[3](79)}。而根据德沃金的观点，这种选择又与禀赋这样的原生运气相互作用，使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辨识出后者对人的影响^{[6](89)}。

再次是起跑门问题。“起跑门”(starting gate)是很多机会平等理论设置的一个节点：起跑门之前人的发展机会要尽量平等化，策略是减轻阶级、家庭因素甚至自然资质的随机分布对人的差别化影响；起跑门之后则按照形式的机会平等原则公平竞争、选贤任能。现实中的起跑门常常表现为某些考试，费西金以“大考”(big test)社会为例指出了这里存在的问题：这种大考允许所有人在某个年龄段参加，通过了就能接受高等教育并在未来获得好的就业前景，通不过则只能从事报酬微薄的工作。费西金认为即使人们在大考之前的发展机会真正平等化了，并且大考组织得公平公正，这样的起跑门还是令人不安。因为被大考筛掉的人就没有多少别的有价值的生活路径供其选择，也就失去了很多发展自身或者实现人的兴盛的机会。并且这种起跑门中的优势劣势会在以后不断放大，有机会的人会越来越有机会，没机会的人会越来越没机会。把一个人的整个人生前景完全“投注”到某个人生阶段的选择和表现，以致失败者很难有改变自身命运的余地，这绝不是公平和合理的做法。

最后是个性问题。这是更深层次的批判，也提示了机会多元主义的解决路径。前面指出机会结构对塑造人的个性有重要作用，但很多机会平等理论似乎并没有关注人的个性发展问题，而只关注确定社会体制下的机会分配问题。在武士社会中，即使实现了公平的机会平等甚至运气平等主义的原则，社会也不过是这样的：“只有一件事值得去做，一种人值得成为，一个生活形态值得打造，没有任何个性可言”^{[1](111)}；在大考社会中，虽然通过考试可能就有许多有价值的生活路径供选择，但这样的机会结构也对人的个性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父母会竭尽全力让子女集中精力准备考试，而子女也只能围绕这条光明的、路标清晰的唯一路径来形成自己的志向，并由此塑造他们的抱负以及他们对成功的定义”^{[1](111)}。“好社会最为包容，最为可能地容许培养和施展有价值的力量”^{[7](101)}，这种社会需要灵活多元的机会结构做支撑。但通常的机会平等理论往往在某种确定的机会结构背景下谈论分配问题，从而不经意间做了它的“卫道士”。沙尔就揭露了美国社会中这种主张的保守性：“没有政策方案比机会平等的方案在加强主导的体制、价值和美国社会秩序的目标上设计得更好，因为它为所有人提供了在

这种秩序中寻找一个位置的公平和平等的机会……这里我们有了美国激进派甚至在自以为打破现存体制之时却又倾向于维护它的另一例证。”^{[8](138)}

上述四个问题使费西金认为机会平等化既不可能实现，又不值得期许。他接下来主张用机会多元主义来代替机会平等化，构建“多元模式”的社会，“使人们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能有更多的机会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追求人的兴盛”^{[1](2)}。

二、机会多元主义

(一) 机会多元主义的原则

1. 价值和目标的多元化

区别于武士社会那种单一模式的社会，多元模式的社会存在很多理想生活的理念，以及对于事物价值的不同认知。这些理念不可通约，不存在谁对谁错，也不能被放到某个所谓普适的量表上加以评判，它们共同塑造了社会中多层次和多样式的机会结构。而这样的机会结构能容纳更多的自由空间，也能塑造人们更丰富的个性。同时，价值和目标的多元化也能缓解不平等的影响。罗尔斯就认为，如果一个社会存在许多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群体，那么人们生活前景的差别的可见度将会降低，人群中的妒忌感也会降低^{[3](424-425)}。

2. 非竞争性以及价值或目标的拆分

机会平等化假定“理想的工作、社会角色或教育机会”是“极为稀缺的”，而“人人都处在与他人激烈的零和竞争中”^{[1](114)}。但是“生活不是赛跑”^②，把机会结构设置成这样的比赛也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会刺激富裕家庭对其后代的优势传递，也会使上面提到的起跑门和个性问题变得更严重。相反，机会多元主义引导人们珍视“与位置无关”(价值不取决于占有者数量的多寡)和非竞争性的事物(如友谊、健康、幸福的家庭等)，这些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反而经常被漠视和牺牲。当然，人类社会中的资源匮乏很难消弭，对一些物品和角色的竞争也不可避免。但费西金认为我们可以减轻这种竞争的规模，比如鼓励人们珍视一定层次的教育而非超过其他人的教育，拥有一定品质的房子而非比别人的更大更豪华的房子等。同时，机会多元主义也防止价值或目标的“打包”现象——一种价值的实现取决于另一种价值的实现，比如金钱可以换来爱情，购买权力，权力反过来也能带来更多的金钱等。划清社会中不同价值的规范领域，有助于缓解零和竞争的规模和程度，维护社会的多元化。

3. 反瓶颈原则

费西金将反瓶颈原则表述为：“应该在尽可能多的情况下，创造通向受人珍视的角色和物品的多元路径，而没有人们必须通过才能得到这些角色和物品的瓶颈。”^{[1](218)}反瓶颈原则是费西金理论中最重要的部分，后面将单独对其进行论述。

4. 权威来源的多元化

该原则触及谁来控制机会结构这个基本的层面。一个社会如果对什么东西重要或者怎样才有资格获得某个机会这样的问题只能服从少数几个权威机构或个人的意见，那么它就一定会倾向于单一化。机会多元主义着力实现相反的情形——存在很多这样的机构或个人，他们的价值标准不一，对机会结构如何安排的意见也有分歧，甚至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积极进行“生活中的尝试”，也就是有创造机会的机会。以信贷为例，如果只存在少数几个大的借贷机构，那么它们出借资金的评估标准就会比较单一，不符合这种标准的群体就面临着投资创业的瓶颈。但是如果存在很多这种机构，借贷的评估标准也就会相对多元，之前没机会的人群就有可能达到某些借贷机构的标准而有了投资创业的机会。

(二) 反瓶颈原则

费西金从瓶颈的种类、严重程度和如何处理瓶颈三个方面阐述了他的反瓶颈原则。

首先，他做了资格瓶颈、发展瓶颈和工具性物品瓶颈的区分。资格瓶颈是人们为获得某个机会而必须满足的资格要求。这种资格要求可能是正当的，如具备某个职位所需的能力素质，这常常体现在某种学历、学位或资格证书上，因此申请者必须具备这样的证书；这种资格要求也可能是随意的，如某些公司在招聘时偏爱某种肤色、某种性别或性取向、甚至有某种宗教信仰的申请者，这些歧视违背了形式的机会平等；这种资格要求也可能介于正当和随意之间，如不录用有不良信用历史、形象气质差、长期失业的申请者等。1971年美国“格里格斯诉杜克电力公司”案就与一种随意设置的资格瓶颈有关。杜克电力公司要求应聘者必须提供高中学历证明，并通过一种智力测试。而这样的要求与能否完成该公司的工作并无必然联系。同时，因为有高中学历的黑人在整个劳动力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这样的资格规定也就对就业市场的种族构成产生了差别化影响，法院最后裁定这样的资格瓶颈非法。

其次，资格瓶颈与人们是否具备某种能力素质有关，而发展瓶颈与人们是否具备培育这种能力素质的

机会有关。因为阶级状况、所处地域等的关系，一些群体的发展机会很少，面临着阻碍他们追求兴盛人生的发展瓶颈。“一个人必须(通常)是在非贫困的环境下成长才能够追求大部分路径”^{[1](234)}，所以阶级本身就是一种发展瓶颈，而阶级差距会通过家庭的优势传递作用而反映到儿童的全方位成长过程中。如贫困家庭的儿童没有富裕家庭的儿童所能接触到的丰富的语言交流机会，他们的语言能力也就发展得相对较差。地域同样会影响人的发展机会，不同地域中人们的受教育水平、就业机会甚至犯罪率等也会不同，这种作用尤其通过机会信息的散播而发挥出来：一个人在不同的地域中会接触不同的群体，也就会从不同的模范表率那里了解不同的人生以及实现它们的路径，最终也就会将这些信息内化成不同的人生追求。“孟母三迁”的故事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而现实中贫困地域的机会信息相对闭塞，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也就面临着严重的发展瓶颈。

最后，如果某种物品稀缺(至少对于某些群体是这样)，但它对于打开人的诸多生活路径是必需的，那么这种物品就会构成工具性物品瓶颈。金钱在当代社会是最典型的工具性物品瓶颈。它对人们的机会选择造成深刻的影响，并促使人们优先去做那种能够带来更多金钱回报的事情，而不是自己真心喜欢做的事情。同时，金钱还直接阻碍了人们对机会的获取，大学学费就是明显的例子。费西金引用2005年美国的一组数据指出，8年级数学分数位列后25%但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完成本科学业的概率要高于位于前25%但家庭条件差的学生，这其中高昂的大学学费扮演了非常不好的角色^{[1](308)}。

可以看出，这三种瓶颈在当今社会的机会结构中普遍存在。如何评估它们的影响以确定优先缓解的对象呢？费西金指出，除了要看它们的随意性和受影响人群的数量，还要看它们的严重程度，即有多普遍(它们堵塞了人们多大范围的生活路径)和有多严格这两个因素的乘积。如果只有很少的工作岗位要求有高中学历，那么这种资格瓶颈的普遍性就不高，而没有这种学历的劳动力人口获得就业机会的难度也不大；如果大部分雇主坚决拒绝有犯罪记录的应聘者，那么这种资格瓶颈的严格度就很高，有犯罪记录的人群就只有很少的就业机会。大考就是一种严格程度很高的瓶颈，它既很普遍，阻碍了很多人的生活路径的创造和追求，又很严格，通不过大考的人将在以后面临很少的生活路径。

那么如何处理瓶颈呢？费西金提供了两种方案：

一是使更多人更容易地通过该瓶颈，二是创造更多不需通过该瓶颈，即绕过它也能获得机会的路径。以招聘为例，如果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岗位都要求能用英语交流，那么不懂英语的人将面临很大的就业障碍。为了帮助他们通过瓶颈，一是可以开展培训来提高他们的英语水平，使他们符合岗位要求；二是创造更多不需使用英语的工作职位。大学文凭是当下就业市场中很严重的资格瓶颈，也可以采用这两种方法来应对，比如科学和适当地扩大高等教育的招录规模，加大助学金的投放力度等能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个瓶颈。但“有时帮助人们通过瓶颈时，可能会使瓶颈本身更为严重”^{[1](365)}，这里通过瓶颈的方法最终会让雇主更加偏好有大学文凭的人。因此绕过瓶颈的方法——减轻大学文凭这只“拦路虎”对追求兴盛人生的负面影响，创造更多不以其为必备条件的生活路径——就显得尤为重要。例如德国完备的学徒工体系，能为那些上不了大学的人群提供从事技术类职业的机会，美国也有很多社区大学，同样能起这样的作用。再比如地域有时构成一种严重的发展瓶颈，不同居住地（“机会之地”或“贫困之地”）的人们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径接触不同的人际网络，从而了解不同的机会信息，并最终形成不同的人生志向。使人们通过这种瓶颈，也就是缓解不同人群因阶级、职业等因素而被隔离的程度，增加他们相互融合的机会以加深他们对不同人生路径的认知水平。使人们绕过这种瓶颈，也就是利用除地域联系之外的其他一些途径来传播机会信息，比如加强学校的教育引导，让更多学生能通过这种更正式的方法了解多种多样的职业行当以及追求它们所需要的能力储备。

三、评析

费西金在这本书中从四个方面批判了机会平等化的主张，这种主张的最精致表现是运气平等主义。伊丽莎白·安德森、赛缪尔·谢弗勒、乔纳森·沃尔夫等人也曾对此进行过批判。他们指出，纠结于环境与选择间的区分，并试图抵消前者对人之命运摆布的运气平等主义没有“对所有公民表达平等尊敬和关怀”^{[9](289)}，因此偏离了平等理念的本意。平等主义正义的准确目的“不是使每个人得其所应得，而是实现人人关系平等的社会”^{[9](289)}。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费西金的批判路向与这些主张“关系平等”或“社会平等”的学者的路向有差异。他是从人的兴盛的角度探讨运气平等主义的消极意义的，他所指出的起跑门问

题和个性问题可以充分体现这一点。这种至善论(perfectionism)的视角可以深化学界对于运气平等主义的理论反思。

费西金宣称用机会多元主义来建构机会平等的工程。但粗略看来，机会多元主义的主题与通常的机会平等理论并无很大不同。后者着力于应对就业、教育等领域中的社会歧视，以及阶级、家庭等因素对人们人生前景的差别化影响。这大致分别相当于费西金所说的资格瓶颈和发展瓶颈，也是其着墨最多的地方，并且他突破这些瓶颈的许多策略也并不新鲜，因此机会多元主义给人一种“新瓶装旧酒”的感觉。但是，费西金的理论确实能对主流的平等主义正义理论有所启示，正如有学者在书评中所说，机会多元主义指出了这些理论通常忽视的问题——机会平等的理想应该为所有人提供什么样的机会和机会的组合^{[10](284)}。费西金在全书的“结论”部分就指出：“我们的规范性目标不应该只关注资源分配，以使人们能够追求自己可能已经形成的目标；相反，我们的目标应当是让人们有机会了解并且接触到更多更丰富的可以追求的路径，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以一种更加自主的方式，从丰富的一组选择中对我们的人生中真正想要做哪些事情做出自己的决定。”^{[1](383)}

费西金提及的“狐狸与鹤”的寓言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狐狸请鹤喝汤，但是汤盘很浅，鹤的喙太长而喝不到；鹤请狐狸时又用了很深的长瓶，狐狸也没法够到瓶里的食物。这里问题的关键就不是怎样分配食物，而是选择用什么器皿来盛饭，以分别给狐狸和鹤提供合理的进食机会。机会多元主义将着眼点从人们占有机会的相对多寡转移到机会结构的特征和性质上来，强调机会结构的多元化，也就是为更多人提供更多追求自我实现的机会。从这种视角出发，费西金注意到机会结构中“严重但相对正当的瓶颈”，这种瓶颈有其正当的存在理由，因而很多机会平等理论家看不到它们对机会结构的负面影响。但费西金认为如果它们极大地限制了特定人群的机会，那么就应该采取措施突破这样的瓶颈。当下流行的某些考试就是这样，虽然可以从设计科学、组织高效、结果公平等方面来对其进行辩护，但如果它们限制了很多人的生活路径，那么就有理由让这些人更容易地通过或绕过这种并非随意设置的机会瓶颈。

与费西金一样，布坎南等人也曾指出，大部分正义理论主要关注利益和负担的公平分配，而把社会合作框架的基本特征看作确定的，但是选择什么样的合作框架对于正义理论来说更为重要^{[11](293)}。布坎南等人

将这比喻为给5到50岁的人选择扑克游戏,假定打规则复杂的桥牌(contract bridge),那么年龄很小的人就很难高效地参与其中,打规则简单的“摸鱼”(go fish)^①,那么任何人都有能力参加。这里扑克游戏的选择决定了参与者在游戏中的机会,以及对这些机会的使用程度,因此它比公平地制定某个游戏的奖惩规则更为基本。布坎南等人由此提醒人们重视社会合作框架的“包容的道德”(morality of inclusion),这与费西金对机会多元的强调有相似之处。

费西金看出了当代平等主义正义理论的一些问题,但是他没有注意到他在对这些理论的批判之路上走得太急了。他认为在分配正义领域中关注机会平等,“不是为什么要珍视机会平等这一问题的唯一答案,甚至不是最好的答案”^{[1](64)},因此主张“超越分配正义”来看待这个理念。但是费西金对机会平等工程的重建,亦即对构建多元模式的机会结构的强调,是否真的能从根本上消解现实中机会占有的不平等呢?这是非常令人疑惑的。而费西金本人有时也承认这一点,他在全书的最后一章指出应该用机会多元的策略——提供更多不可交易的服务或物品等来应对当下愈演愈烈的阶级分化现象,但随后又说这种措施的效力是有限的,“任何一个关注机会平等的人都应该同时关注限制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1](304)},这又重新回到了分配正义的话题。

塑造多元的机会结构,为更多人提供更多的生活路径固然比机会的分配更为基本,但它的实现程度受社会发展条件的制约,因此不能脱离历史情境而抽象地谈论该问题。费西金的理论就有这种失误的嫌疑,他说给一个有数学天分的原始人提供施展这种天分的机会,也就是把她从远古美索不达米亚带到“能够发展自己独特数学才智的当代社会和教育体制中”非常重要^{[1](192)}。但十分明显,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同样也不能为人们提供超历史的机会或生活路径。费西金认为通常的机会平等理论无情地引导人们关注机会占有的相对多寡,关注对于稀缺机会的零和博弈,因此他要用机会多元的路径来取代机会平等化分配的路径。但是资源与机会的匮乏是人类面临的永恒主题,某个社会的机会结构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历史必然性,这决定了解决机会不平等的问题首先应该从分配入手,试图用其他的手段绕开或消解这样的问题只会演变成“对不平等的合理化”^{[12](177)}。

皮特·威斯顿在一篇分析机会平等的著名文章中指出对该概念要做具体化理解:“机会”“是一种形式的关系——主体X,关于障碍Z,对于目标Y的关系。

它是就X而言,实现Y(如果他如此选择)而没有Z的阻碍的可能性”^{[13](842)},而“平等”“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东西”^{[13](845)}。比如,中国人享有就业中不受性别歧视的机会平等,这里的XYZ分别是中国人、实现就业和雇主的性别歧视;美国人享有利用枪支自杀的机会平等,这里的XYZ就变成了美国人、自杀和缺乏枪支。可以看出机会平等的理念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它“既不是一种状态,也不是一种理想——既不是难以实现的,也不是内在可欲的”^{[13](837)}。所以不能把机会平等看作正义理论的全部,机会多元主义同样如此,正如约翰·贝克所说,机会多元主义追求的理想“只能作为激进的平等主义计划的一部分而被提出。假装不这样做的代价是把机会多元主义变成与它对立的意识形态的遮羞布”^{[12](178)}。

注释:

- ① 很多正义理论区分了自然的和社会的不平等,这与它们对遗传和环境的假定性区分紧密相关,有学者对此做了批判性分析,参见Levens T. What are ‘Natural Inequalities’?
- ②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活不是赛跑”的提法来自平等主义的批判者罗伯特·诺奇克,参见诺奇克. 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 姚大志,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283。
- ③ “摸鱼”的规则很简单,一方通过向另一方要牌或抓牌以凑齐更多4张相同的牌。

参考文献:

- [1] 费西金. 瓶颈: 新的机会平等理论[M]. 徐曦白,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 [2] GALSTON W.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liberal Theory[C]//LUCASH F. Justice and equality: here and now.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89-107.
- [3] 罗尔斯. 正义论(修订版)[M]. 何怀宏,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4] WILLIAMS B. The idea of equality[C]//POJMAN L, WESTMORELAND R. Equality: Selected reading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91-102.
- [5] RAKOWSKI E. Equal justic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 [6] 德沃金. 至上的美德: 平等的理论与实践[M]. 冯克利,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
- [7] FISHKIN J. Liberty versus equal opportunity[C]//POJMAN L, WESTMORELAND R. Equality: Selected reading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48-158.
- [8] SCHAAR J.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and beyond[C]//POJMAN

- L, WESTMORELAND R. Equality: Selected reading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7–147.
- [9] ANDERSON E.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J]. Ethics, 1999, 109(2): 287–337.
- [10] OLSARETTI S. FISHKIN, JAMES. Bottlenecks: A new theory of equal opportunity[J]. Ethics, 2016, 126(3): 821–825.
- [11] BUCHANAN A. From chance to choice: genetics and justic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12] BAKER J. JOSEPH FISHKIN, Bottlenecks: A new theory of equal opportunity[J].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2015, 41(1): 170–178.
- [13] WESTEN P. The concept of equal opportunity[J]. Ethics, 1985, 95(4): 837–850.

Fishkin's critique at opportunity "equalization" and his opportunity pluralism

ZHANG Hu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Shan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Ji'nan 250002, China)

Abstract: Fishkin thinks many theories of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usually treat "equalization" as the best paradigm when thinking about distribu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opportunities. But opportunity equalization is faced with four problems-the problem of family, the problem of merit, the problem of starting-gate, and the problem of individuality, so it is an unattainable ideal. He proposes a plan of reconstructing the project of equal opportunities- Opportunity Pluralism, which emphasizes establishing diverse opportunity frameworks, broadens the "bottlenecks" of creating and acquiring opportunities in order to make people have more ways of "pursuing human flourishing". Fishkin points to the problem often neglected by the theories of egalitarianism justice, that is, what kind of opportunities, and in what combination, should be made available to people. But it does not mean that we can interpret it beyond distributive justice.

Key words: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Fishkin; Opportunity Pluralism; anti-bottleneck principle; luck egalitarianism

[编辑: 胡兴华]